

天津文史資料選輯

第十八輯

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
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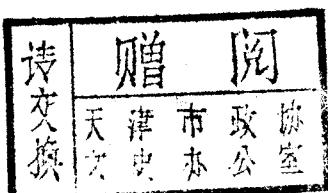
K250.6
8
2:18

天津文史資料選輯

第十八輯

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一月



A867019

天津文史资料选辑

第十八辑

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6 3/4 插页2 字数149,000

一九八二年一月第一版

一九八二年一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4,800

统一书号:11072·96

定 价:0.67元

目 录

黄河召唤系我心 张含英 (1)

解放前海河干流治理概述 冯国良 郭廷鑫 (25)

一九二七年至抗战前天津新闻界概况 俞志厚 (39)

天津《益世报》概述 俞志厚 (70)

日寇“北支派遣军”机关报——《庸报》 孙立民 (94)

• 天津租界史料汇编之二 •

天津日租界概况 孙立民 辛公显 (111)

附：旧日租界路名对照表 (151)

天津横滨正金银行与魏家两代买办 魏伯刚 (153)

红帽衙门与白帽衙门 张玉璞 (182)

我所知道的方若 张同礼 (189)

汉奸恶霸袁文会的一生 刘静山 (202)

补 | 旧中国黄河大堤隐患多 (24)

自 | 有关间谍金璧辉的一点资料 (181)

黄河召唤系我心

张含英

童年时黄河报警的锣声——为治黄河学水利——一九二五年的黄河决口——探索历代治河经验——下游实地考察——一九三三年黄河大水灾——积累资料研究治黄——经过多年探索提出治黄纲要——黄河巨变

一、童年时黄河报警的锣声

我是山东菏泽人。菏泽在山东西南，原属曹州府治，黄河流经北境，废黄河流经南境，历史上曾长期为黄河泛滥区域。唐末在这里爆发了黄巢起义；北宋以来，这一带也不断发生农民暴动。我就出生在这个贫穷、动乱的地方。

童年时，每到夏日夜晚，常和祖母、母亲在院中乘凉。仰望天空，群星灿烂，我指着天河问祖母那是什么？祖母说：“那是天河，天河和黄河相通，过几个月，天河就挪到那边去了！地上的黄河也常改道，黄河之水天上来呀！”我似懂非懂地听着老人的叙述。她接着说：“有一年，在一个倾盆大雨的夜晚，电光闪闪，雷声隆隆，黄河便随着从南边滚到北边去了。”母亲在一旁也说：“五十年前黄河真的搬了家，是你祖母亲身经历的事！”我满怀疑团，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，但它

却在我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年稍长，常听到长辈和河工叙述防汛抢险的紧张情况。又每在伏秋季节，听到黄河涨水报警的声音，便有人敲起响锣，高声喝喊：“咳！咳——黄河发水了！咳——黄河发水了！”锣声、喊声，激荡着人心，震动着人们的神经，它动员着人们必须警惕起来。这时，护城堤上在封土，人们在收拾东西，或作着各种必要的准备。这样，渐渐知道锣声和生命有关，与看星星、看天河、讲黄河时的心情，完全不一样了！

上中学时，国文老师讲起清咸丰五年（1855）河南兰阳（今兰考）铜瓦厢决口、黄河改道的事。（明、清黄河本自兰阳东至江苏徐州夺泗，东南至淮阴，汇淮入海。清咸丰五年黄河大决于此。全河分三股东北流，穿运河后，夺大清河入海，二十年后，决溜三股，合并为一，即今黄河。）下课后我问老师，铜瓦厢是怎么决的口？回答是：“黄河一决口，水就哗哗地往北流。”我又问：“大堤是怎么被冲开的？”老师就回答不出了。这次黄河改道，大概就是祖母所说的黄河搬家的故事吧！

在学校读书时，知道黄河流域是中国文化的摇篮。中国上古史就谈到黄河的事，黄河那么重要，难道真的没法治吗？大禹治水远在四千年前，难是难，还是治了；今天，黄河如此泛滥，为什么没人去治理？

生长在三年两决口的黄泛区，黄河决口、改道、抢险、报警的锣声，从幼年便在头脑中构成可怕的景象。它迫使我去思考这些问题：黄河为什么那么狂暴凶残？为什么决口、改道？这一切，促使我走上学水利的道路，跟黄河打了一辈子交道。

二、为治黄河学水利

曹州虽是一个贫穷、落后和充满各种复杂社会因素的地方，却激起人们改变穷困的念头，比较容易接受新思潮，即当时所谓“振兴实业，改良教育”。一些前辈到日本留学回来后，对山东教育界曾起过影响。如我读书的菏泽县第一小学堂，便和进私塾、念“子曰”不同，是“穿制服，进学堂，读课本，下操场，还把新式歌曲唱。”上中学时，不但有物理实验、化学实验，而且很多老师都是日本留学生，教学质量较高。那时，由于环境影响，很早就升起了一个青年人对未来的理想——去改造自然，去探索黄河决口、改道的秘密，去研究怎样才能修好坚实巩固的堤坝。理想推动我去刻苦学习。那时中学四年，分八个学期，除去第一学期外，每个学期我都是案首。

一九一八年中学毕业时，听到人们说，北洋大学土木系最好，因此，我的第一志愿是考北洋大学，不仅没有第二志愿，而且在京、津同时报考北洋大学。

我能幸运地考进北洋大学，非常高兴，但困难也真不少。我在中学时成绩虽然不错，外文却不行。北洋的英文、德文课都是外国人教，专业课本多是英文原版，也大都是外籍教师讲课。北洋大学的降班制度严格，因而我脑子中始终担心降班。所以，入学以后很少离开学校，顶多到校门外的桃花堤上去看看；一听到学校钟声，就赶快回去。在这种严格的学习生活中，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。

第二年，因参加“五四”运动而被学校开除。我虽志愿上北洋，但认为“爱国无罪”，拒绝递悔过书，只好转学到“五

四”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。北大没有土木系，我改学物理。

一九二〇年我参加山东官费留学生考试，考为备取生，便以备取资格获得补助费赴美。次年夏，东渡太平洋。

官费留学生每月九十元，一年一千多元；补助费留学生一年只有四百元，相差悬殊。我选中了一所学费不高、声望较好的学校——伊利诺斯州立大学。我是靠给饭馆刷盘子、干临时工，维持了三年的学习生活。

学校规定，在校期间一定要学会游泳，至少要能游五十码。那时中国学生近百人，很多人为此退学。时间很紧，冬天不下水打战，我也坚持去学，完成学校规定的各种项目。

毕业时，得到荣誉结业证。要获得这种荣誉，必须三年中的成绩A占50%以上，C不能超过25%，不能有D。这是相当困难的。我在一九二四年毕业，土木系只有两个人获得这种荣誉，一个是我，另一个是美国人。此后，我又到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学习一年，获土木工程硕士学位。于一九二五年回国。

三、一九二五年的黄河决口

一九二五年夏，菏泽城北临濮集附近李升屯民埝决口，急流逼近大堤（民埝为临河小堤，决后水流于南岸民埝与大堤之间）。民埝决口处宽约三、四里，最深处十五尺，平均有六、七尺。距李升屯下游约二百里处，洪水又冲决黄花寺大堤口门五处，为害黄河南岸广大地区。河务局派人经过菏泽去李升屯调查，准备估工，听说我在国外专学水利刚刚回国，邀我同去。遂欣然前往。

出临濮稍北行，就到了黄河大堤，高约二十尺，顶宽二十五尺，边坡约为一比二。登堤北望，长天阔野，飞沙茫茫，残

木枯树，渺无人影；大堤附近洪水虽已退去，而淤沙之多，实出人意外。柳树的树身完全埋没在泥沙中，只有柳条一、二露在外面。高粱则偶有穗头露出，过去村庄今成一片沙丘。我深深感到黄水之为害实在太深重了！

在这次调查中，亲自看到了黄河决口和堤防的实况，认识了山东河务局的工务科长潘万玉和一些老河工，得到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，对黄河为害的情况有了一些了解。

黄河堤分官堤、民埝两种：官堤即大堤，归政府修理、养护，以保堤外财产。官堤距河稍远，自数里到十数里不等。由于河滩地的土地肥沃，所以人民又在大堤内修筑民埝，用以防洪，便于种植。其间住户稠密，乡村、集镇与别处无异。惟以大堤不常临水，民埝决后，常危害大堤，因而溃决。

黄河两岸大堤相距很宽：河南境两岸堤距宽二十里，到山东、河南交界宽四十里，到山东寿张、东阿一带慢慢窄下去，一般只有二里宽。站在大堤上，可以看到河槽高于地面，水总是迂回着流。在河水流近堤身、冲刷到堤的地方，则须加筑护岸。护岸是为了巩固堤防，兼有导溜离堤的作用。

当时护岸为埽工。埽料就是秫秸或谷草，用麻绳捆扎，然后层土层料，修成护岸。由于山东、河南一带盛产高粱，价钱便宜，容易得到，埽工护岸比用其它方法快，又经济。但它的缺点很多：一、每年必须加扎，从长远计，并不经济；二、秫秸比重小，易于浮动；三、扎埽之处，多为溜淘而塌坍之坡，埽的重心因而居上，必然不稳；四、秫秸为绳所连系，在埽被土压，绳失去连络之效时，则易走失；五、用土压埽，水很容易将土冲走，埽亦常因此失去护岸的效果。

针对这种情况，我提出黄河应改筑石护岸（长江就是石护

岸）。这个意见立即遭到反对。有人说：“长江能用石护岸，但黄河不能用。”也有的说：“某某人早已用过不行。”在堤上我问工务科长，为什么不行？他慢吞吞地说：“秫稈满地都是，一有险情，马上就作，料早都备齐，工人又熟练。”老河工说：“守堤不易啊！几千年就是这样干的！”还有人说：

“多年治河，书上都是这么说的，是几千万年的经验总结，不能变啊！”后来我才明白稽埽易腐易蟄，且易冲失，故须年年加镶，大水时，又必须加紧抢修补救；且工程多在水下，加镶、抢修用料若干，实难计核，走失若干，也难查询。如此便可上下其手，成为靡费贪污之源。“利河多事”，故河患日甚。如果黄河改用石护岸，便无利可图了。我开始懂得治理黄河不单纯是工程技术问题，还是一个社会问题。

由此联想到我在山东建设厅工作时，还提过引黄灌溉和水力发电等天真的建议，也曾得到类似的结果。我建议引河水灌田，遭到反对，便又提出试用虹吸管抽黄河水试验浇地。由于河务局不同意，只好作罢。后来动用省的力量，经过相当长的时间，才同意在靠黄河大堤的齐河南岸，由河务局选定地址，允许安装一个小型虹吸管，作为试验。

利用水力发电的建议，同样受到阻止。他们根本不相信水力可以发电。为了说明利用水力可以发电，在济南小东门外，利用东流水安装了一个小水电站。河上电灯亮了！但亮了也就亮了！没有人再去关心如何推广的事。作为一个工程技术人员，满怀热情想在治理黄河中有所作为，但在这种环境中，纵有千言万语，也不能讲，没法讲，眼看着黄河成灾，残害人民，却束手束脚，还谈得上什么治理？只好退下来看书，从理论研究方面尽一分力量。但当时又缺乏以新技术治河的资料，

难得深入研究。于是，我只好从治河史学习起。

四、探索历代治河经验

当年在美国学习时，柯乐斯教授曾对我说：“你研究水利，知道中国有条黄河吗？”我说：“这是一条为患四千年的大河，流经我的家乡，从童年时就知道。”“你有意除患兴利吗？”我答：“志之久矣！而未得其道也！”柯乐斯教授遂将他所搜集的黄河资料四大册相借。作为一个外国学者，他所搜集的资料，在当时已经是相当丰富的了！对我后来从事黄河问题的研究，有很大的帮助。

汉贾让治河有三策：徙民避水，不与水争地为上策；广开水门，多开渠槽，分水灌田，以分水势，而免河患为中策；修缮再西三东，围筑数重之故堤，则为下策。由于因循不定，致使十七年后河道南徙。

后汉永平十二年，王景主持治黄，修汴渠。其法为整治河槽，修筑堤防，水门放淤，以减泥沙。近世李仪祉评论说：“中国治河历史虽有数千年，而除后汉王景外，俱未可以言治。”

宋代河道紊乱，始终未治。元代治河能臣贾鲁，主张疏、漫、塞三治并举，并于盛涨季节堵塞决河七年的白茅口门。明代早期黄河泛滥不堪，分流最多达十一支。潘季驯治水，主张“以堤束水，以水攻沙”的治河方针，并主张“堤以防决，堤弗筑则决不已；故堤欲坚，坚则可守，而水不能攻。堤欲远，远则有容，而水不能溢。”因而坚筑堤防，纳水归于一槽。他还定四防二守之法，四防为昼防、夜防、风防、雨防；二守为官守、民守。

清代继承明时治河策略，仍重堤防。所以“河防”一词，在清代盛行一时。

靳辅在康熙年间为河道总督，著有《河防一览》，其中附带一本为陈潢的《治河述要》。他们对黄河下游的修堤、防汛都曾有过重大贡献。

张靄生《治河述言》中说到靳辅大部治水意见，都是陈潢代写。说明陈潢对黄河有过接触，作过深入的研究，他的意见在黄河史上价值很高。

我早年所处的时代，是近代科学技术在我国萌芽的时代，也是新技术、新理论与旧观念、旧习惯斗争的时代。在治河方面，有国外学者提供的理论和意见，有我国学者研究的成果，也有从事河务工作多年、根据经验的成论著说。这些意见，或相合，或相反；或对旧者怀疑，或对新者蔑视。议论纷纷，莫衷一是。

总的说来，历代治河策略，专讲“河防”，重在下游。基本态度是受当时文化科学水平的限制，人力不能战胜自然。

研究了历代治河的文献资料，我得出两点认识：

第一，要制定确切的治河计划，必须有正确的科学根据。如一年内流量的变化，历年变化的比较，河床的淤垫变化情况，降坡和切面的变化情况，各地的堤距及河槽宽度比较研究……等等。在以后的数十年中，不管担任什么职务，我一直致力于这方面资料的搜集，作为研究、应用近代科学技术治理黄河的依据。

第二，过去治河多侧重孟津以下，认为迁徙漫决都在下游。考查黄河为患之主要原因，实际上来自上游（包括中游）。上游各支流水系，都以扇形冲刷泥沙，顺流而下，流至下游，

才形成淤垫漫决之患。故专治下游，不是正本清源的办法。

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四日，《大公报》载华北水利委员会第九次委员会中，李仪祉提议“导治黄河宜注重上游”一案，首先提出治河宜注重上游的主张。他说：“数十年以来，但注重下游，而漠视上游，毫无结果，故惩前毖后，深望研究黄河者，知所取择也。”三天后，我在《大公报》发表《论治黄》一文，对李仪祉的主张表示支持，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商榷。我认为李仪祉所持“治理黄河宜注重上游”的看法，在当时来讲，是个治河的新法，和旧日“专治下游”相对而言，能够吸引人们注意；但若从治黄整体而论，只注重上游，又觉有所欠缺。

文中提出商榷的问题主要有两个：

一个是说下游治理也很重要。过去虽说注意下游，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治理。如今年列为险工的，明年必仍为险工；今年已决口的，明年仍有决口的危险。象李升屯、刘庄、黄庄、富家坝等地，历年所谓“治河工程”，不过是“抢险工程”而已！特别是下游不畅，上游必决，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。黄河之难治，一为携泥沙很多；二为洪流来去迅速。自黄河改道由利津入海后，七、八十年间，淤出新地近三百万亩。黄河入海口门，其乱如网。上游洪水暴涨，口门不畅，宣泄不通，水不能下行，必然出险。黄河之根本问题，泥沙多固为主要，下游不畅，也是黄河致病的原因。所以说下游之急待治理，并不减于上游。

另一个是阐述了黄河难治的社会原因：一、畛域之见的危害，治河应统筹全局，黄河下游的河南、河北、山东三省的河务局，各不相谋。如冀鲁之交，出险次数最多，河北决口，祸

在山东；河北因利害较轻，不加注意；山东则以职权所限，不能超越省界整理。二、治河人员囿于旧习，不能采用新技术。如提倡机器打桩，轻则不理，重则将机器故意破坏。又如旧法“合龙”极待改良。山东黄河河务局潘万玉根据科学原理，采取各国通行之新法，施行时，职工都旁观，稍有失败，则加辱诟。三、尤其是河务人员责任心差，认为河务为发财机关，不顾工程质量能否维持长久，惟恐来年不再决口。再有地方财政困难，除非生死关头，汛情紧急，否则都避免涉及。建议应成立统筹全局的黄河水利委员会，要有孚众望的人才办理。

李仪祉对于我所提出的不同见解，不但没有非难，反从爱护、培养出发，以科学的态度，谦逊地容纳我的意见。一九三三年九月三日，当南京政府正式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时，李仪祉还同意我为该会委员，并兼任秘书长。这一任命，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。由此可见他实事求是的学者风度。

五、下游实地考察

一九三三年十月，南京国民政府特派王应榆为黄河水利视察专员。王邀我陪同视察利津至孟津一段，前后共十八天。

这次视察从利津经齐河至官庄，达十里堡，沿堤西行见郓城、鄄城、菏泽一带沙碱干枯，非兴水利不可。再到刘庄，已入河北省界。刘庄为第一险工，水自西北来，至刘庄陡折北流，约七十五度，所以南岸堤防非常危险。地在河北，决口则尽淹山东，山东人民对此极为关注。但因地域关系，谁也没有办法。

入河北先到濮阳，过东明、至开封，经郑县，达武涉，经孟县、洛阳，最后到达巩县。王应榆继续西去潼关，我则以事

乘车返回济南。

这次实地考察丰富了我对黄河的感性认识。我比较全面地了解了黄河下游河道、官堤、民埝、护岸以及河防和淤淀情况，特别是对河务工程上存在的迷信、保守思想，狭隘的地域观念，以及缺乏全面的、系统的兴利除害的规划、部署等问题，获得了深刻的印象。

在利津本拟到海口视察，因河道情况不详，地方不靖，未能成行。我们找到熟悉河口情况的河工和船家进行调查。据说：宁海以下无堤防，河水漫流于三角洲。宁海以下至海口约一百一十里地，大水时，水深十二尺，小水时四五尺。如沟通水运，船可至天津、大连。鱼以梭鱼及虾为大宗。海滩约为四百万亩，潮界内产豆，每年有一季收成。每亩可收三元（未开垦的生地）。

过去关于海滩新淤之四百万亩荒地，我曾作过初步研究，深知海滩是一富源，农民有自德县、临清一带前往耕种者，耕作一季，足敷一年之用。为什么垦殖事业不能发展？其原因有四：一、治安不能维持；二、宁海以下无堤防，黄河漫溢于三角洲上，人民耕种困难；三、无淡水饮用；四、交通不便，管理不得法。

黄河河口三角洲以利津东的宁海为顶点，大体包括北起徒骇河，南至支脉沟口的扇形地带。如果修筑堤防，固定河道，竣工后，地方则可振兴实业，增加富源。视察后，我曾据此写成《黄河河口之整理及其在工程上经济上之重要》一文，以阐述之。这些议论在旧中国统治时，都不可能实现。现在听说三角洲的顶点已从宁海下移二十余公里，到渔洼附近。三角洲成了滨海绿洲，河口建立了胜利油田和海口渔场一些现代化工

业，和我视察时相比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

六、一九三三年黄河大水灾

一九三三年七、八月间，黄河上游各省，阴雨连绵，山洪暴发。宁夏、绥远、陕西都已成灾，淹没村舍、田地无数。黄河流到河南，一出邙山，就决口二十三处。在冀、鲁、豫交界处，分成五股外流，洪水下注，波涛汹涌。黄河流量在陕县为两万二千秒立方公尺，流量之巨，是自有水文记录以来所未有。灾情非常严重。

这次水灾，陕西、河南、河北、山东等四省，总计受灾人口3,642,514人，占受灾各省总人口的26%强；受灾面积34,549平方公里，占受灾各省原有面积18%强（据民国二十二年黄河水灾调查统计报告）。

在洪水横流之际，南京国民党政府于仓促间，第一次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，任命李仪祉为委员长，王应榆为副校长，我为委员兼秘书长。

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调查黄河水灾情况，主办堵口工程。不久实行以工代赈，此事移交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办理，黄委会仅负责对黄河的治理及善后工程。

黄委会成立后，对下游三省河务局，名义上是领导关系，实际上连指导也指导不了。下游三省河务局提出了双方业务上分工的要求。他们说：“黄河上游调查、研究、测量你们管，黄河下游工程不能动。三省河防是千年经验积累，不用问。”的确，关于水文站、测量队的工作，他们都不管，但是讽刺打击却不断。如提到治理黄河应兴利除害时，他们就说：“唱高调，患还没除，还谈到兴利？”在从事地形测量、水文观测、模型试

验时，就讽刺说：“没事干了，拿这玩艺消闲解闷啊！”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，黄河还是明、清时代的老样子！

后来旧河工人员夺了权，由曲阜孔姓某人出任黄委会的副委员长。此人头脑封建迷信，靠烧香、扶乩，决定堵口日期。他背后有孔祥熙支持。李仪祉辞职，将我调为总工程司。我将李仪祉遗留的未了事宜作了处理后，很快也离开了黄委会。

在黄委会工作期间，虽然工作不顺利，但却是我最值得回忆的一段时间，因为亲自接触实际，去过许多地方，也参预一些工作的计划和实施。对于治河，在前辈领导和同事的共同努力下，自己也初有所得。

这期间，我对黄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。对黄河的决口、改道、修防等问题，逐渐形成一些新的看法。

技术人员们在当时条件允许的调查、观测的范围内，对下游河道的治理，坚持研究，并对治黄的方针、措施展开讨论，提出建议，为以后的治黄工作奠定了微薄的理论基础。

七、积累资料，研究治黄

我国历代治河经验虽极丰富，但属于古代科学技术范畴。例如：对于流水与泥沙的控制，古人已知水流的涨落与大小，而不知其量的多寡；知其涨落有时，而不知其量的变化过程。又如：已知泥沙量大及其危害，如称“斗水六泥”，并知其“善决，善徙”乃由于“善淤”，然亦不过仅从概念出发，不知其确切数量，更不知其变化与运行的规律。是以只能空泛议论两岸堤距的宽窄，不能得出符合自然实际的计划；虽有“束水攻沙”的理论，而在执行上亦只能从经验出发。若欲以近代科学技术治河，则必须具备实地观测的数据，作为计划的张本。